

蕭公權全集 之五

翁同龢與戊戌維新



K256.5

18/5

蕭公權先生全集⑤

翁同龢與戊戌維新

蕭公權・著 楊肅獻・譯



72•7•0584

•8900415•

蕭公權先生全集⑤

翁同龢與戊戌維新

著者 蕭 公

譯者 楊 肅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七號

電話：七六〇一六—二一三七

郵撥：一〇〇五五九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初版

定價：平裝本一〇〇元  
精裝本一五〇元

## 出版說明

一、蕭公權先生(1897-1981)一代通儒，士林共仰。民國六十八年春，本公司約請汪榮祖教授編輯「蕭公權先生全集」，其間因版權交涉與編校工作遷延時日，全集未克於先生生前出版，不勝遺憾。

二、全集計分九冊，凡先生重要著作，均一一收入。

三、第一冊收集先生自傳、書信、談話及紀念文字，匯為一編，名為「道高猶許後生聞——自傳·書信·談話錄」。

四、第二冊係根據先生手書詩詞「迹園詩稿」，「迹園詩續稿」暨「畫夢詞」等三種，合為一帙，影印出版，名為「小桐陰館詩詞」。

五、第三冊「政治多元論」(*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為先生博士論文，特譯為中文出版。

六、〔中國政治思想史〕原於民國三十四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今詳加校訂，增列相關論文暨索引，重排出版，並遵先生親囑，列入全集第四冊。

七、第五冊〔翁同龢與戊戌維新〕，原爲英文著作，刊於〔清華學報〕新一卷二期，特譯爲中文出版。

八、第六、七冊分別爲先生英文專著〔十九世紀之中國鄉村〕(*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及〔康有爲研究〕(*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 K'ang Yu-wei, Reformer and Utopian, 1858-1927*)二書，特聘專家逐譯爲中文，陸續出版。

九、第八冊〔憲政與民主〕爲先生論政之作，原書於民國三十七年出版於上海。

十、第九冊〔述園文錄〕收輯先生中文雜著暨中譯英文論著二篇。

十一、先生治學精勤，著作富贍，除專書外，散見中外報章雜誌，網羅匪易，爲求完備，特將本編未收英文短篇論文存目編爲「蕭公權先生未收論著目錄」，附於〔述園文錄〕書末，以供讀者參考。

## 弁言

〔翁同龢與戊戌維新〕原係英文論著，發表於一九五七年四月出版的清華學報上，今由楊肅獻譯成中文，列爲蕭公權先生全集之第五冊。

翁同龢江蘇常熟人，咸豐六年（一八五六）狀元，後以同光兩朝帝師，久值中樞，對晚清政局影響至巨。蕭先生深入分析翁之性格與心術，及其與戊戌變法運動興亡的因果關係。翁氏雖有忠君之心，然亦不無一己權益之念，其政治目的實在以其個人爲主導的變法運動。職是之故，李鴻章、張之洞雖與翁俱屬溫和的改革派，而翁不惜事事阻撓，蓋因李張的聲名與權力非翁所能駕馭。是故乃大力引進新銳：如張謇、湯震、陳熾等，以爲己援，康有爲亦因此而進。然康進用之後，極得皇帝信任，且康之變法思想遠較翁爲激進。翁復圖沮康以自保，於是觸怒亟謀變法圖強的光緒帝，而遭罷黜。一般認爲保守派促慈禧太后斥退翁師傅，自非實情。故非由翁同龢的「心

術」不能洞悉翁氏何以引進康氏於前，復沮之於後，以至罷黜的經緯，蕭先生於此書中指出，戊戌變法維新時期的政爭不僅是單純的新舊思想之爭，且參雜了無關新舊的個人權益之爭。翁同龢當然不是唯一「利己」之人，但他的「利己」行動却對變法運動影響深遠。假如翁氏只謀「忠君」而不圖「利己」，能與較溫和的改革派李鴻章、張之洞輩合流，縱不能使腐敗的清廷國富而兵強，至少可避免殘酷的政變，延長變法維新的壽命。蕭先生認為無論如何變法終無成效，革命之終不可免。但在當時許多士人如陳寶箴等，甚信若由張之洞領導溫和改革，則變法大有成功之望。如陳氏所言不虛，則翁氏一己之行動關係戊戌維新運動的成敗，尤大矣哉！

法國漢學家白斯蒂女士也研究翁同龢，她覺得蕭先生對翁同龢太「狠心」了，想是指對翁氏野心與隱情的揭露。但是歷史學家只應問分析得是否正確與公平，却不應該有婦人之仁。劉勰史傳主張為賢者諱，有云：「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此於現代史學標準而言，不僅是不必要而且不應該。但時至今日，中國的現代史學家對近代人物的評估能無隱無諱，不偏不依者，殊不多見。蕭先生在本書中所展示的「和盤托出」筆法，值得大家借鏡。

汪榮祖 謹撰於維州柏堡庸橡樓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三日

# 目錄

|                  |     |
|------------------|-----|
| 出版說明             | (一) |
| 弁言               | (三) |
| 導言               | 一   |
| 第一章 翁同龢的學術與心術    | 五   |
| 第二章 翁同龢與時人的淵源及關係 | 二七  |
| 第三章 翁同龢與兩宮的關係    | 四三  |
| 第四章 翁同龢與康有爲      | 七一  |
| 一、變法觀的異同         | 七一  |



|                     |     |
|---------------------|-----|
| 二、翁同龢對康有爲的態度·····   | 九七  |
| 第五章 翁同龢的罷黜及其意義····· | 一一七 |
| 一、罷黜的原因·····        | 一二七 |
| 二、對翁同龢的評價·····      | 一二四 |
| 三、翁同龢對罷黜的反應·····    | 一二九 |
| 四、溫和改革的繼續·····      | 一三二 |

## 導言

本文的研究係根據一種假說：若對「戊戌維新」這種重要事件的發生，不明瞭其產生的歷史環境，便不可能適切了解。而要明瞭這個歷史環境，最便當的方法，便是以此一時代一位重要人物為核心，並從此環境有關因素與影響力來追溯史事。

翁同龢顯然正契合我們的目的。他擔任清德宗帝師二十餘年<sup>1</sup>，在塑造這位青年皇帝的思想上，扮演著重要角色。爾後，活躍於北京官場，取得光緒多年的信賴，直到西元一八九八年被罷黜為止。此外，他也獲得慈禧太后三十餘年的信任，除了高官厚祿，並兩度出任帝師。在一八八

<sup>1</sup>亦即在一八七五年至一八九六年間。不過，在一八九四至九六年間，僅有斷續的教授。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以下簡稱「日記」）卷三三，頁一二三a，卷三五，頁五b。

○年中俄條約正在商談的那段紛擾日子裏，又賦予他協助決定要政的責任。在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八年間，他的官運亨通，歷任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入值總理衙門、協辦大學士等。因此他縱然不能實際決定朝政，仍對清廷大政有極大的影響。在另一方面，他也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在北京官場中，他是所謂「南派」的兩大領袖之一，成為清末大臣中黨派之爭與私人恩怨的核心人物。因此，了解翁氏的態度、活動與人際關係，特別是他在一八九〇年代表現，正可做為研究戊戌變法有用的導引。

我希望本文提出的證據可以證實下列暫時性的結論，一、百日維新之所以發生，不僅是由於少數朝臣志士秉愛國之誠，欲救國家之危亡；也是由許多個人動機與制度等錯綜複雜的因素所促成的。二、支持或反對維新的人，不止是因為他們在思想上有「進步」或「保守」之別，亦因他們感到變法維新與他們切身利益有利害關係。三、變法維新所以未達到其支持者所期望的結果，並不單是受到保守派——包括從思想上及既得利益上反對變法的人——的抵制，而且也是

<sup>2</sup>〔清史稿〕，「列傳」，卷三二二，頁二a。

Bland and Backhouse,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pp. 158-9; 180-3;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3, p. 133 Bland 與 Backhouse 的可信度曾廣受質疑。本文著者所引用的都是書中有用的部分，這並不表示全書都被普遍認為。

「南派」是個很模糊的概念。此處援用這個名詞目的僅在強調翁深捲入黨派之爭中。

南派的另一個領袖是潘祖蔭（一八三一—一八九〇），見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Vol. 2, pp. 608-9.

因為受到反對無限制變革當前政治者的強烈反對；換句話說：變法運動面臨了無從克服的困難，不但「保守派」反對，即「溫和派」亦加以反對。四、包括翁同龢在內的一八九〇年代溫和改革論者代表著自一八六〇年代開始而持續至清朝覆亡的一個趨勢，而康有為的變法則與此一普遍趨勢相背離。因此，戊戌政變雖推翻了康有為的變法，卻未中止此一趨勢。五、即使翁同龢及其他溫和派人士的願望得以實現，戊戌維新運動也挽救不了搖搖欲墜的帝國，這是歷史情勢所使然。

在某種程度上，翁同龢是個爭論紛紜的人物。他的同代人及後世史家對他的評價殊不相同。有時候，他被視為變法的支持者，有時卻被指為保守派。近日的學者對翁氏其人及其歷史角色各有不同的解釋與評價<sup>1</sup>。但是，進一步的探討仍舊是有用的。筆者或無原創性的解釋，僅擬透過細節的研究，追溯現有的線索，以期對整個情勢提出一套較完備的看法。

翁同龢卷帙浩繁的四十卷手寫日記是最重要的原始史料，它或許不是完全正確或可信的紀錄；實不能提供歷史家所希望得到的全部資料。但是，其大體上可信，則屬無可置疑。即令它

<sup>1</sup> 有兩篇特別值得注意：Ho Ping-ti, "Weng T'ung-ho and One Hundred Days of Reform," *Far Eastern Quarterly*, X (1951), 125-135 (here after, Ho, FEQ.) 吳相湘，「翁同龢康有為關係考實」，〔學術季刊〕，卷四（一九五五），頁一一—二。

<sup>2</sup> Ho, "Weng T'ung-ho and One Hundred Days of Reform"

曾經過原作者的修改；改動的幅度似乎也不太大。當然，翁的日記與當時其他人如康有爲、梁啓超諸人的著作一樣，在使用時仍需謹慎。其中不免含有黨派之見、個人恩怨及常有的記憶錯誤。其他各種不同的記載必須用以與這些事實一一對照，只要處處留心，則翁氏日記及當時其他相關著作應可提供許多重要資料，從而推出有效的結論。不過，有許多資料，筆者未能見及，所得的結論自難能確切。

翁同龢自己暗示他可能修改了日記中的某些部分。〔日記〕，卷三八，庚子，頁五b（一九〇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云：「檢日記至甲午年，振觸多感。」，頁六b云：「一日只檢日記一本，甚厭其煩，多所振觸。」後來所記的日記指示，翁氏只是「看日記」。翁氏或許認為把一八九四年以後那多事的幾年中所記的部分重新翻閱並訂正一遍，較為明智。從他每日「檢」一本看來，他似不可能全面改寫。見〔日記〕，卷三八，頁五一b—五二a。

吳相湘，「翁同龢與康有為關係考實」。

## 第一章 翁同龢的學術與心術

有些歷史家對翁同龢作這樣的評價：

同龢久侍講幃，參機務，遇事專斷，與左右時有爭執，羣責怙權，晚遭譴沮，幾獲不測，遂斥逐以終！。

這段評價很難說是讚譽之辭。細讀他的日記，特別是他早年所記的部分，會令人感到這個評斷有所根據，翁同龢在紀錄自己某些隱秘的思想和情感時，無意中透露出他是個雄心勃勃的官僚，渴望在仕途出人頭地；同時，他也是個嚴肅的學者，深深關切這個多難的帝國。

他在三十二歲（中進士後六年）那年除夕所記的日記最能道出他的心情：

1 「清史稿」，「列傳」，卷二二三，頁四a。

夜闌靜坐，爆竹甚稀，蟻強微臣，上念先帝雲霄之隔，俯覽東南水火之深，百感填膺，慷慨思奮矣！欲立一誓，從心體上著力，凡富貴利達之念，掃除淨盡，然後能任得事，

然後能見得理，勛之哉！

兩年後的新年元日，他在日記中記道：

自念華髮垂顛，修名未立，自會以始，當以著誠去妄為第一事，日夕自勉而已。

然而，十年後，當他晉升為戶部侍郎後，他深信自己將在宦途上飛黃騰達，因而迫不及待地着手準備迎接這麼一天：進一步的高昇會帶給他「紫禁城騎馬」的榮譽。一八七六年，他承認自己所以練習騎馬，固然在便於行路，同時也有助於治病；而「其實命意別有所在。」<sup>4</sup>大約兩年之後，他終於獲得了這期待已久的恩典。另一樁似乎微不足道的行為也可為翁氏這種情懷提供一些暗示。他屢次談及皇室賜給他的種種恩典與榮寵。在許多場合，他一再細數所赴宮宴的種種細節，包括席次的安排，出席的賓客，以及留給他與其他同僚的特別席位等。

<sup>2</sup> 翁同龢，〔日記〕，卷二，頁一三六b。

<sup>3</sup> 同上，卷四，頁一a，甲子。

<sup>4</sup> 同上，卷十五，頁四〇，丙子。

<sup>5</sup> 同上，卷十七，頁六五a及卷三十，頁六五a。

<sup>6</sup> 同上，卷二二，頁六八b（一八八三年）中有一個很好的例子。當翁同龢甫入軍機六個多月時，「辰初一刻入座，在東邊門第三間，二十年來由第五間至此，釣天之夢長矣！一間惇、恭兩王，二間惠王等近支，三間軍機四人，四間尚書等九人，五間毓慶宮二人，……」

在國家或個人利害瀕於危殆之時，翁氏與大多數國人一樣，常祈助於神明。例如，在一八七一年，華南某些地區流傳著「妖異」之說，翁氏把它解釋為外人即將侵擾中國的惡兆，並為之憂心不已<sup>7</sup>。他曾多次把種種可怕的自然現象解釋做惡運當頭的惡兆<sup>8</sup>。某次，他的侍妾患重病，他親赴北京的一座關帝廟祈神保佑<sup>9</sup>。直到一八九四年，中日議和期間，他曾釋一夢，說是將「伏於夷」的惡兆<sup>10</sup>。

翁氏的日常行為實與當時一般心懷大志而行為嚴謹的士大夫無顯著差別。他的思想、見解亦復如是。跟同代其他的士大夫一樣，翁氏完全浸潤於一般人普遍接受的儒學傳統之中。但是，他並未一貫地遵行程朱學派的信條。程朱之學乃當時的官學，許多大官，特別是倭仁、徐桐兩人，都信奉程朱之學<sup>11</sup>。翁氏一度對程朱的敵派陸王學派深感興趣<sup>12</sup>，但是不久之後，他還是轉而崇拜朱子之學<sup>13</sup>。這種折中的思想態度促使翁氏後來接受了李鴻章的思想——李氏是批判理學最為直

<sup>7</sup> 翁同龢，《日記》，卷十一，頁七三 b。

<sup>8</sup> 例如，同上，卷三十，頁六六 a，六七 a（一八八一年）；卷二六，頁五六 b（一八八七年）。

<sup>9</sup> 同上，卷二八，頁八〇 a（一八八九年）。

<sup>10</sup> 同上，卷三三，頁一〇三 a（一八九四年）。這條說：「夜夢拜母姨於高樓。姨者夷也，拜，伏也，非吉兆也。」

<sup>11</sup> 倭仁和徐桐兩人都排外並反對變法。Hummel, *Eminent Chinese*, Vol. 1, p. 407 and Vol. 2, pp. 861-3.

<sup>12</sup> 翁同龢，《日記》，卷一，頁一〇 b（一八六〇年），庚申，卷四，頁一 a（一八六五年），甲子。

<sup>13</sup> 同上，卷七，頁二六 a、二七 a、五二 a、七三 a、七五 a（一八六七）。



率，最有影響力的人之一<sup>14</sup>。

或許部分受到李鴻章調經世致用而反對程朱格物窮理的影響<sup>15</sup>，翁氏對國家大事極為關注。在此之前，翁氏對英法聯軍一役幾乎漠不關心。他只在日記中記著「夷兵」入城，依舊安然地從事著一般學者的例行工作，做詩、練字，好像這個國家根本不會發生過什麼大事。當清廷與太平軍及捻匪做殊死之戰時，他同樣未表關心<sup>16</sup>。遲至一八六二年，他似乎依舊過著一般士大夫的優閒生活<sup>17</sup>。然而，一八七〇年，在他對李鴻章表示崇仰之後兩年，他對當時擾攘國中的大事開始表現真誠的關懷。當他聽到天津暴民殺害法國公使，破壞教堂的事件後，徹夜未眠，思索這件事情的後果<sup>18</sup>。同樣地，他也關心一八七一年的朝鮮局勢<sup>19</sup>。五年以後，他任戶部侍郎時，曾研讀有關財政經濟的書籍<sup>20</sup>。一八八八年，任戶部尚書，擬訂了他的基本財政政策：「內庫積銀千萬，

<sup>14</sup> 翁同龢，《日記》，卷八，頁一八b（一八六八年）。

<sup>15</sup> 一八七〇年春，當帝師們商討年輕的穆宗皇帝的課程時，這點可能就首次表現出來了。翁反對徐桐（朱學的忠實信徒）的

觀念，並說：帝師應「急時務而緩理性（即理學）」，同上，卷十，頁二八。

<sup>16</sup> 同上，卷一，頁一一a—五三b，散見各頁。

<sup>17</sup> 同上，卷三一，頁八九b。

<sup>18</sup> 同上，卷十，頁二八b。

<sup>19</sup> 同上，卷十一，頁六七b。

<sup>20</sup> 同上，卷十五，頁九b，丙子（一八七六）。